

“理论旅行”的跨文化传播意义

踏春时节，很自然地想起那个让人心动的隐喻——“理论旅行”（travelling theory）。萨义德发明的这个隐喻揭去了抽象、宏大的理论面纱，代之以“理论”需要永远“在路上”的亲切体验。而触碰这个隐喻的我们，往往是想走出自我的封闭圈，不由自主地受萨义德牵引，想象理论的跨文化旅游：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孕育自身；在全球化浪潮中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寻找新的栖息地；在新的环境和语境中，遭遇吸收、抵制或误读，发生种种变异；在新的时空环境中适应文化间竞争关系，融入新的理论话语。

大多数时候，理论被“道路”“桥梁”“河流”“脉络”等隐喻格式化了，凸显规训、异化等意义，把人与理论都禁锢在里面。相对而言，“理论旅行”指向理论主体，还原了理论的原始意义。英文“theory”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 *theorin*，其首要意义是“旅行和观察”，另外也可以被用来描述“从一个城邦被派到另一个城邦去参加宗教仪式的人”，即所谓怀抱使命的见证者。由此想象一种理论的姿态：怀抱使命，在旅行中走出自我，受事物的某种意象引导，在焦虑与不确定性中认知事物，走在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、笃行的路上。

人的反思性与超越性是理论旅行的动力所在，理论主体在观察与解释世界的过程中建构并拓展文化交流圈，确立并传承特定的社会规范与思想范畴，形成思想竞争关系。理论也常常环绕自身旅行，建构独特的文化疆域，封闭自我，陷溺在“未思”的陷阱里面，用“我们”的语汇去简化思想，把来自他方的思想当作“异端”，或加以驯化。然而，当理论主体意识到自己的感性限度与经验限度之后，便会产生到他方或别处去“看”的冲动，实现个体性超越和普遍性超越。就像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·于连所说的那样，经由他方，反思文化中的“未思”之处，展开文化间的交谈，建构更宽广的理解视域。

理论主体走向他方是全球化时代普遍交往的结果，由此成为参与多元文化互动、多元文明对话的人，等待他的可能有三种文化互动形式：一是陌生人互动形式，漫游于多元文化世界，通过陌生化的视角审视自我和他者的经验世界；二是边缘人互动形式，立于边缘文化区域，体验文化冲突、社会失序与社会变革；三是世界公民互动形式，站在他者的角度思考，形成平等交往的“我-你”关系，面向世界性问题。不论是哪种互动形式，都会使理论主体由参与客观观察转向参与主体间交往，通过理论概念和客观经验建构主体间交往关系，摆脱理论的单向流动所形成的权力支配关系，实现理论创造的自由。

理论旅行预设理论主体回到人与万物互联的交往空间，不再有确定的知，而是充满不确定性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理论总是远离特定语境，朝向潜在的解读。理论的间距化不再是理解的障碍，而是被人们视为理解的条件。在间距化的理解中，理论主体才能觉察自身的偏见，发现他者的视域。当理论迁移到异域，它就像西美尔的“陌生人”一样，带来远距离观察的优势。同时，又促使与之相遇的解读自觉地经历一个使文本的言说“陌生化”，到重置语境的认识过程，从而以去语境化的方式，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，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。所以说，理论主体会在特定的语境中通过对话关系找到交谈者，也因为语境的消解而面对未知的交谈者，开辟理解的无限可能性。

旅行涵盖认知的、创造的、超越的理论精神以及观念传递、移植、流通、交流的自由空间，因此，理论的目的即旅行。在面向问题与可能性的旅程中，理论与那些或望向深渊或望尽天涯路的目光交织，其想象力得以延伸。

单波

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